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2.003

历史转变中的二元对立

——对1915—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社会性考察

王 健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文学理论的构建不仅包含了文学的自觉, 还包含了时代中形成的社会性诉求。新文化运动是诸多激进知识分子立足个体性的理想主体探索新的社会结构的尝试, 它以文学为阵地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新文化运动之后, 文学所承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有了冲突, 二者也在“怎么写”和“怎么做”的问题中充当了各自不同的角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价值在于为这些二元对立找到了弥合的方法, 融合二元所形成的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所在。其在回应“怎么写”问题的同时, 也回应了“怎么做”问题。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 理论建构; 二元对立; 新文化运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2-0019-07

引用格式: 王 健. 历史转变中的二元对立: 对1915—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社会性考察[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2): 19-25.

Binary Opposition in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 Social Survey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15 to 1949

WANG J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not only contains the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social appeal formed in the era.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s the attempt of many radical intellectuals to explore the new soc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ideal subject of individuality. It takes literature as its front and forms a series of binary oppositions. Afte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re wa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carried by literature. The two also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write” and “how to do”. The value of Mao Zedong’s *Speech at the Yan’ 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lies in finding a way to bridge these binary opposition. The system form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binary is also the value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While responding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write”, it also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o”.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inary oppositio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Speech at Yan’ 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收稿日期: 2020-0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 王 健(1985—), 男, 山东成武人, 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中国现代思想史。

如今,文学理论被视为一门理论学科,对其发展史的追溯也常是局限于其教材的历史变化,而忽视了其变化在历史中的社会意识来源以及在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角色。事实上,每一次文论的构型也是一次社会事件,这就需要我们突破文学理论建构在学科范围内的理解,更加深入到社会价值的层面,审视其在思想转变、社会结构转变中所起到的,或者是想要起到的作用。多数对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进行梳理的研究中,无论是立足新民主主义文论、启蒙主义文论还是中国特色文论,都会将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这段时间视为现代文论的形成期。这些文论彼此之间的争锋,再加上这段时间本身就是社会转折期的原因,造成对这一时段文论发展理解的千差万别,大家对这段时期文论建构的理解充斥着诸多对立,比如新与旧、文学与政治、个体与大众、世界性与中国化等的对立。

面对这些对立,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们多借助哲学式的悖论将之融合。在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相应部分的执笔人旷新年的表述就是:“一方面,现代‘纯文学’的文学观念将审美凸显于现代文学价值的中心;然而,在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文学又并非是单纯地属于‘纯粹艺术’的,它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替代传统经学承担了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一个非常明显的构成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是现代的纯文学观念的建立,另一方面却是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突出与强化。”^[1]张灏、汪晖也是采取类似做法,这也构成了文学乃至思想界的普遍处理方式。悖论固然能够在认知层面增强容纳能力,解决因一系列政治争论而带来的理解窄化问题,但过于哲学化的处理却会让文论建构在社会转变层面的作用有所失色。本文以现代文论作为研究对象,以这一时段二元对立背后的意义变化为线索,力争廓清理论建构背后的社会性诉求——如此不仅有助于澄清历史冗陈,从起点处审视现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目的与方法,也能更多从社会性层面介入对文学理论构建思路的探讨中来,对其未来发展拓展出更多可以借鉴的思路。

一 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性诉求

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核心,在晚清以降对“革新”的呼唤已成普遍共识的前提下,致力于更激进地将科技改革推向文化与政治的改革。而且,这群以留洋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新文化倡导者显然不信任自清帝逊位以来就动荡不堪的政府政治,他们尝试独立地寻找新的“德”先生,尝试通过文化革新来构建超越现时政治的更稳固的未来社会结构。

在这种语境下,不仅对“德先生”,连对“赛先生”的追寻也不只停留在自然科学层面,它也深入到了社会科学层面,承接了西方社会科学对个体价值以及民主社会的讨论,对此汪晖的说法是:“陈独秀的‘科学’概念虽然完全指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使用范围却主要在伦理道德和信仰的领域,‘科学’在此是作为建立合理的人生原则、社会秩序和信仰的有效武器而被运用的,其功能是‘修身之根本’,而‘修身’或称‘伦理的觉悟’则是赢得民族和国家的富强的基本前提。”^[2]基于对“赛先生”的探索,新的文化轮廓被初步确定下来了,杨联芬对这种轮廓的描述是:“确立了以‘进步’为指向的社会文化的线性发展图示”,“确立了以西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典范的坐标”^[3]。立足于这群知识分子的留洋经验与对国外文化与政治的理解,他们构建了“新”的民主方向。他们把阻碍自己目标实现的东西归结为“旧”,尝试通过批判来实现从文化到社会的激进转变目的。基于此目的,《新青年》的编者借助“双簧戏”,从形式到内容狠狠批判了林纾的翻译;也忽视了姚永朴等人试图“化古为今”所编撰出的文论教材。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激进知识分子以文化为载体对未来社会秩序的探索,他们借新旧对立的形式确立了新的文化轮廓,毛庆耆、杜书瀛等研究者对文艺“现代形态”的认同其实起源于对这套文化逻辑的认同。

此时的文学革命明显是更广泛的文化革新构想当中的一部分。陈独秀1920年对新文化运动作过如此总结:“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

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文化还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等运动。”注意事项是“新文化运动要注意团体的活动”“新文化运动要注意创造的精神”以及“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4]。从这些表述中，我们能够看出陈独秀对文化影响力的高度重视。在这种语境下，文学与政治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新的文学所承载的未来社会探索与现存政治秩序之间的对立。陈独秀们想要通过文化构建永恒的社会结构以取代现行政治结构，理想但又模糊的“西方”成了他们的参照。因此，此时倡导的文学与政治的对抗并不是要脱离政治，而是要对抗由现行政治构造的混乱的社会秩序，将激进知识分子对未来理想社会新的探索推向更多数人，其显示出知识分子试图用隐性的新政治取代显性的旧政治的努力。

文学与政治的对立也可以转换到个体与集体的对立上来。这里的个体是承载未来的理想主体，它融入了这些激进知识分子的希望之中，比如独立于所有现实政治、有探索精神、敢于反叛等，其内核是文学与政治的对立。通过文学革新，这群激进知识分子试图将他们的青年受众塑造为能够承载理想主体的“新青年”，因此这时回应文学“怎么写”与回应青年“怎么做”的问题是有重叠的。新的文学纲领从诞生之日起，实际上就面临着双重任务：它既需要建立与新的未来构想相匹配的文学理解方式，建立以新的理解方式为基础的创作方法；也需要通过革新对文学的认识，将青年塑造为理想的未来主体，达到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的目的。前一个目的影响了其对文学理论的建构，后一个目的则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最终鹄的。

二 建构理论的路径与难题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文论教程翻译的兴盛年代，这源自于知识分子从其文化构想出发所形成的重新认识文学的意图，理论的译介过程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甄选的过程。他们所翻译的理论往往是他们想要读者如此理解文学的理论，以落实他们所构想理想的主体样态与未来秩序。此间作家的集团化也让这些尝试呈

规模化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后继者都在为其文学构想寻找相应的理论载体，期间堪称畅销书的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章锡琛译，1925 年）可为此中典型。该书认为文学需要“通过想象与情感而诉诸读者的想象与情感”，并认为“有活泼的文学，便是有活泼的国民；在文学已死的时候，国民性的精神是不可能独生的”^[5]。这里情感与想象的因素被无限放大，由此构建的新文学被视为更新政治的重要手段。其内核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体与集体的对立相连，从而很容易将他们对文学的认识贯彻到构造理想未来主体（个体）的尝试中去，并将这种推论视为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研究方式。除本间久雄的著作外，此间翻译的其他外国教材，如厨川白村、韩德等人的著作也有类似痕迹。

除译介外，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在尝试将其文学纲领落实到创作中去。他们或者以创作谈的形式教导如何写作，比如《新青年》上就发表过一些创作谈，如俞平伯谈新诗创作，讨论的就是如何表达自我情绪；或是借助自身创作经验直接介入到文学理论的构建中来，比如郁达夫的《文学概说》、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等，作家的身份更能为他们所构建的理论提供说服力。《文学概说》是郁达夫 1925 年在武昌师范大学的讲稿，他认为文学的根蒂是：“‘生’的本质……我们非但想把这生存继续下去，同时且更有想使这生存强固扩充的心思，所以我们的生存在世上，实在是这一种内部的要求反动的结果。这内部的要求，就是‘生’的力量，生物学者称他为本能。……从心理的进化方面来说，‘生’就是使无意识的活动变为有意识的，意识的活动变为反省的，反省的活动变为道德的活动的动机。这就是‘生’这一个力量所有的动向。总之，‘生’的动向，是使人类一步一步从不完全的路上走向完全的路上去。……我们的存在，就是‘生’的力量的具象化。……‘生’是如此的具象的表现在我们身上，而表现就是创造。”^[6]在这里，郁达夫将新文化运动对理想主体的要求转化成了个体的内生机制，相比于本间久雄对情感性的强调，它更方便于将对理想主体的认同推向对新文学、新文化的创建。新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方法的成型有效回应了“怎么写”的问题，但知识分子却在通向“怎么办”

问题时遭遇了麻烦:它表现为在面对现实社会中的饥饿和枪炮时,这些文化设想只能停留于知识分子之中而无法获得更多受众的共鸣。这种无力感在战乱时期尤其突出,这也使得很多有革新意图的青年纷纷转向,这一点从成仿吾、郭沫若、鲁迅等人在二三十年代的思想转折中很容易看出来,如何将文学中所蕴含的构想落实到社会转变中去也因此成了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死结。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在后来常被创造社等左翼社团所攻击,也使得在其理论中文学与政治、个体与大众的对立一直存在。二三十年代,国内对世界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一战后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也影响了知识分子对“西方”道路的选择。“新”的方向落实在哪里,对建构怎样的文学理论至关重要。

以俄为师的道路,早在新文化运动时就有学者倡导过,也出现了很多依据此项理论所勾勒出的文论纲领,比如李大钊的《俄罗斯的文学与革命》、茅盾的《文学者的新使命》等。经由苏联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此时已是一套相对成熟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方式,它与政党政治结合在了一起,由政治革命带动对相应文论的建构。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普罗列塔利亚”(大众)和“唯物史观”的观点融入对文学问题的理解当中,继而确立相应的文学理论,就成了左翼文学团体的一项文化任务。在左联的机关报《文学》的决议中就有如此论述:“关于创作的任务,方法,题材等,以及关于文学批评的任务和方法等。要尽量地利用自己的机关杂志发展讨论研究,以走进正确的解决。左联的理论机关杂志,必须负起建立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任务。”^[7]无独有偶,在1930年上海新文学运动者讨论会(见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左翼作家联盟消息(见1930年5月《萌芽月刊》)的宣言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要求。在形势的需求下,也在政党的推动下,大量诸如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苏联理论家的作品,诸如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天马书社,1937年)之类的教材被译介到国内;也出现了很多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编撰的文论教材,比如顾凤成的《新兴文学概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和谭丕模的《新型文学概论》(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等。

在教材中,顾凤成对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论述是:

“研究作者自身的条件及其所属的阶级,以及当时社会的条件及一般意识形态。要明白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由来,我们不得不追踪并把握其过去的历史和考察那时代的社会的经济、法制、政治等条件,和探讨那社会所借以形成的自然的环境。”^[8]以生产力发展为根基,以阶级斗争为方法,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这些理论家翻转了新文化运动建立的一系列对立:新旧之别被安置到了社会主义之新和资本主义之旧当中。由于立足现实革命,大众取代了个体成为理想性的未来新主体,这也改写了文学所要承载的内容。对此,顾凤成的论点是:“文学不仅与社会生活有着深切的关系,而且文学是非个人主义的,它是一种大众的集团的东西。”^{[8][23]}不同于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先要回应现实中“怎么做”的问题,并由此反哺“怎么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为这种理论的兴盛也提供了外部条件。

与“大众”逻辑相应的是对大众化途径的探索:以大众为主体是一回事,获得大众的共鸣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左翼政党与文学社团致力去探索的,其在战争中更是生死攸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谈到了大众化的方法,是“必须立即开始组织工农兵贫民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组织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研究会读书班等等”,以及“实行作品和批评的大众化,以及现在这些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9]。这里涉及的是“如何宣传”的问题,顾凤成、谭丕模等理论家回应多半在“宣传什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独特性的强调削减了对其他创作方法的借鉴,因而其无法对“如何宣传”作出有效回应。老舍曾质疑类似的理论仍是传统“文以载道”的延续,认为这与这些理论家基于理想个体基础上的文化构想格格不入。此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遭遇到了两方面的麻烦:一是大众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不熟悉会影响到他们对其文论的接受;二是如何将这些理论贯彻到创作中去,使之既能完善其文论体系,也能依靠文学作品在大众之中扩大影响力。政党政治的优势体现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中。在延安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推广为革命干部的普遍教材,这加速了马列主义理论的

普及工作，也为其文论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但对第二个问题，仅靠对苏联经典作品的翻译很难给予有效应对：如何创造出蕴含马列理论却能让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是顾凤成等人的文学理论难以回应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后世对这些理论家只是翻转了二元对立的意义却经常陷入到与新文化倡导者的缠斗中的印象。

两种文论之争背后是两种政治探索之争，因不同的探索路径而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对于二者而言，谁能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将对方构想吸纳到自身的体系中，从而形成更强的阐释能力，谁就能够吸引大多数。

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系化价值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中“怎么做”与“怎么写”问题的脱节，左翼知识分子们并非没有注意，他们一直以来也没有停止过对文学创作方法的讨论。这些讨论多集中在如何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的层面，比如在 1936 年，周扬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胡风也出版的《文学与生活》《现实主义的一“修正”》两部作品。这些都是建构方法的尝试，其核心意义就在于如何将“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结合起来。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也是在这种语境中参与到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当中的。当下的研究者对《讲话》的阐释，更多是侧重其“群众政治”（周展安）、“大众化”（旷新年、文贵良）或者“对当代文论的启示”（谭好哲）等话题，本文则将它放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时代矛盾中去解读，这样能够更有效地去审视其时代价值。

与其他以苏俄为师的学者相同，毛泽东也继承了蕴含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中的新旧逻辑，因此也沿袭了倡导文化革新的知识分子思路上的分歧。毛泽东的起点仍是对现实革命的强调，依靠现实革命的合法性来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合法性构建问题，大众（人民）依旧是其理想主体：

“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

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0] 他将“写大众生活”置于“写个体感性”之上，试图以“大众生活”作为表现主题构造新的现实主义方法，这沿袭了其他左翼理论家的一贯思路。但他也借助于现实革命的切入点，将文化革新派的理想个体置放到了现实革命所营造的理想社会的构想中来，将其中个体与大众的对立转换成了战争中先进的革命大众和落后的小资情趣作家之间的对立——虽然二者的对立既有阶级层面也有认识层面的，但通过对后者的强调，原本在政治阵营中的双方也可以转变为认知中先进与落后的区分。通过对未来构想的融合，毛泽东将新文化倡导者的思路变成自己构想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这也让他的表达经常具有多重指向，比如：“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10]859} 这既可以理解为是对左翼知识分子“怎么写”问题的回应，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倡导文化革新的知识分子“怎么做”问题的答复。统一未来需要统一实践，统一实践需要统一思路，统一思路需要统一标准，这个逻辑在《讲话》中清晰地浮现出来。毛泽东的政治权威身份有利于这套逻辑的最后定型与推广，但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引发了不小争议。

在这个逻辑中审视文学与政治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传播中理论与创作之间隔阂的消除仍是关键，《讲话》的做法是设置了两项判断的标准：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0]869-870} 政治内容即表达经马列理论塑造后的革命任务。对未来建构的统一也让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再拘泥于对建构独特表达方式的追求。只要能够符合对政治内容的表达，题材与方法可以放宽限制，不仅是新文化运动时形成的所有表达方式，甚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是可以继承的遗产。树立两项判断标准的价值不仅在于可以为理论摸索创作，也可以修改其他的创作手法使之贴合到革命的内容当中，后者即“改造旧形式”的过程。周扬对此的阐释是：

“利用旧形式并不停止于旧形式，保留旧形式的整体，而正是要在艺术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

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11]毛泽东并没有为理论普及创造独特的文学表达方法,但他通过融对立为一体的构想扩大了“怎么写”的方法来源。这个做法不仅完善了马列文论的构建体系,为批评建立了标准,还为其创作方法实现了扩容。后来随着丁玲、赵树理等人作品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文论最终成为了国内文论界的主流。因此,《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形成的意义在于,其建立起了理论构建、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能够融为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整体——其价值不是来自对文化革新构想的克服,而是来自面对现实更强的阐释力与更有效说服多数人的宣传能力,其所倡导的未来政治构想也会在多数人的实践过程中得以落实。在《讲话》之后,经由蔡仪、林焕平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为读者解读文学作品、认识世界都提供了阐释路径。新文化运动以来新与旧、个体与大众、文学与政治等二元对立依旧存在,但在《讲话》中成了同一体系中能够相互转化的因素,其能够从认识有效地通向实践,其阐释力就来源于此。这套文学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也长期风靡,直到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新的实践问题,才在新时期被重新改写——这时原本已被容纳的二元又重新作为问题被提出。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文论的苏联化是和革命的苏联化相联系的,文论中对中国化的强调与政治革命中对中国独特性的强调相关: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讲话》中延续了这一提法。后世把这种提法追溯为中国文论有意识地摆脱外在、寻找带有中国特色构建体系的理论起点。但这种对“中国化”的强调并不是与世界的断裂,因为它依旧保留着外向性的起点,在《讲话》中即表现为,“人类”和“世界”的视角仍然是毛泽东所强调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10][87]}其文艺与革命的最终目的仍然与世界共产主义中消灭阶级的目标相联系。中国化体现在建构文论方法乃至现实革命中对自我意识的呼

唤,但这种意识的视野仍是世界性的。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化和世界性之间并不构成对立,对前者的强调更像是调整自身文论构建乃至革命方法进入世界秩序路径的尝试。

四 社会性视域中的文论建构经验

本文所强调从社会性视域解读现代文学理论构建的问题,即审视不同的理论建构在构建理想的未来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虽然其中未来理想不同,彼此碰触的困境也相异,但他们面临的都是少数人如何将未来设想贯穿进大多数人那里的问题。从1915年到1949年,新与旧的对立从笼统的中西对立转向具体的马列主义中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对立,其所承载的理想主体也从个体转向了大众。每种转换都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方式,也影响了其对文论建构样态以及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思考。这些转变固然有受政党政治以及连绵不断战争影响的原因,但马克思主义文论最终形成的启示在于,哪一种文学体系能够更广泛地结合其他因素,说服更多人接受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实践能力,谁就会最终确立其领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文学理论建构的思考就需要超越当下因学科化、哲学化形成的理解范式,从更加宏观的社会性角度去审视其未来的建构方向与理论设置。从这个角度讲,本文的梳理大概能够为此提供三项反思,它们分别是:

第一,重新审视文学理论建构中体系化的价值。

当代中国文论的一大重要现象就是反体系化思潮的兴盛,这种思潮反对的是蕴含在体系各元素内部的价值对立,这些价值对立与政治评判息息相关,反体系因此就与平等化的意图相连。这也符合本文的论点,对文论问题的设想与对社会建构的意图是相关的,后者面临着将构想推广到多数人,构成改变现实社会秩序的实践力量的问题。这需要对二元对立的设置形成纲领,也需要将“怎么写”和“怎么做”的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说服力。体系化价值会在这个层面显现出来,其意义并不在于对其他构想的排斥,而是整合。

第二,重视文论建构周边诸如文学翻译、创作的配合作用。

如果将文论构建放在社会构想中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其过程与相应的文学翻译和创作一直是相互补充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理论家在根据自己的构想选择文论教程的同时，也都在按照类似标准来译介国外文学作品并调整自己的创作。根据阿英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1917 到 1927 年期间所出版的译作共有 225 种，其中理论 25 种，作品总集 13 种，其余分国别译作共 187 种^[12]。延安的文艺运动更是如此，对画像、秧歌剧等艺术的探索是和文论建构与翻译结合进行的。如此相互补充的过程也是形成合力的过程，它会影响到社会实践的走向。学科化将视角集中于教材构建的做法很容易造成对合力的忽视，从而忽视文论构建中的社会构想试图转化为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重新审视中国化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文论与文化建构进行中国化思考的声音不绝如缕，个中有近代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民族压迫以及一些学者借国外理论对自身问题进行“强制阐释”的问题，但通过本文的梳理亦可知，我们对现代文论乃至社会秩序的构建一直都伴随着对“西方”镜像的参照与认同。世界性作为我们建构现代文论与社会秩序最终方向的思路从未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我们选择以哪一种“西方”作为参照。在这种条件下审视世界性和中国化的对立，与其执其一端，不如将问

题转化为这种对立在哪些问题中产生，落实为如何调整自身参与到世界等问题当中，这对于未来文学理论的建构或许更具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杜书瀛,钱 竞.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 2 部(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
- [2] 汪 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科学话语共同体: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218.
- [3]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
- [4]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新青年,1919,7(5):1.
- [5]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M].章锡琛,译.上海:开明书店,1930:125.
- [6] 郁达夫.文学概说[M]//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 5 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72:66.
- [7]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秘书处.关于左联理论指导机关杂志《文学》的决议[G]//马良春,张大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192.
- [8] 顾凤城.新兴文学概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0:191-192.
- [9] 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G]//马良春,张大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180.
- [1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0.
- [11]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4 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415.
- [12] 阿 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影印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357-360.

责任编辑：黄声波